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唐宋天文星占与 帝王政治

赵贞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唐宋天文星占与 帝王政治

赵贞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天文星占与帝王政治 / 赵贞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4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ISBN 978-7-303-20187-7

I. ①唐… II. ①赵… III. ①天文—占星术—关系—政治—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7360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TANGSONG TIANWENXINGZHAN YU DIWANGZHENGZHI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插 页: 3

印 张: 33

字 数: 54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28.00 元

策划编辑: 刘松弢

责任编辑: 赵雯婧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肖 辉 王齐云

责任校对: 陈 民

责任印制: 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5079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唐宋天文机构的设置与改革	(28)
第一节 唐宋天文机构的建制	(29)
第二节 乾元元年(758)肃宗的天文机构改革	(41)
第三节 宋代的天文机构改革	(53)
第二章 唐宋天文管理及人才培养	(57)
第一节 唐宋时期的天文观测与奏报	(57)
第二节 唐宋天文管理及人才培养	(74)
第三节 从诏令到判——兼谈唐宋的天文政策	(93)
第三章 唐宋天文星占的理论和方法	(109)
第一节 唐宋天文星占的基本方式——分野占	(110)
第二节 唐宋天文星占的重要方式——星官占	(128)
第四章 日食的发生及对政治的影响	(137)
第一节 唐宋的日食观测、记录和预言	(137)
第二节 日食的发生及对政治的影响	(156)
第三节 “合朔伐鼓”——唐宋日食救护礼仪	(176)
第四节 关于“贺太阳不亏状”	(189)

第五章 “彗星见”与唐宋帝王修省	(195)
第一节 “彗星见”与帝王的修德活动	(195)
第二节 “彗星见”与唐宋帝王的修政措施	(208)
第三节 除旧布新——帝王受禅的天象依据	(237)
第四节 附说彗星禳灾活动	(249)
第六章 唐五代“五星凌犯”及其他	(252)
第一节 “荧惑犯太微”与宰辅大臣的政治乞退	(252)
第二节 月食、月犯昴、流星和大星	(267)
第三节 附说“白衣会”	(279)
第七章 唐宋祭祀礼仪中的天文背景	(286)
第一节 唐代祭天礼仪中的星官神位	(288)
第二节 唐代祈农神祇的天文背景	(313)
第三节 唐代“老人星”的观测及寿星壇的设立	(327)
第四节 宋代的“德运”之争与大火星的祭祀	(338)
结 语	(349)
附录一 中国古代的星官命名及其象征意义	(359)
附录二 唐前期政治斗争中的天文背景	(375)
附录三 唐五代太史局(司天台)天文官员略考	(384)
附录四 宋代天文官员表	(408)
附录五 《晋书·天文志》“史传事验”编年表	(429)
附录六 《隋书·天文志》“五代灾变应”编年表	(464)
参考文献	(478)
索 引	(502)
后 记	(516)

绪 论

一、选题缘起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天象的观测是密不可分的。《易》曰：“天垂象，圣人则之”，这样天象与人事就建立了对应关系。^① 三代以降，由于帝王“通天”的需要，所谓的“星占历算之学”已经在那些专司沟通天、地、人、神关系之巫史神职人员的知识系统中占据了重要位置。^② 春秋战国，星占由于最能说明天命所属的象征意义，因而在各诸侯国的内政外交中愈显重要，大有代替卜筮地位的趋势。到了西汉武帝时期，儒生董仲舒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学说对先秦诸子思想进行系统整合。由此，天降灾异与帝王的“修政”、“修德”联系起来，而居于国家最高占卜层次的星占，由于帝王“修德”的介入而儒学化了，“奉天承运”因此成为帝王政治中不可或缺的理论根据。

自《史记·天官书》开始，历代正史《天文志》（《天象志》）都以相关的篇章记载了日、月、五星、彗星、流星以及二十八宿等的变动及其运行情况。如此连续、完整的记载，究其原因在于，“帝王们认为天象与皇家的兴亡和政治

①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晨’，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30《天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673页。

②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的臧否有着直接的关系，是政治的外化和参照”。^① 若就史传占验而言，这些星变预示了“君主忧”、“大臣死”、“边兵起”、谋叛、旱灾、饥荒、盗贼等方面的政治和社会危机。^② 实际上，星占在政治、军事、祭祀以及社会生活中的预测功能，较为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各种社会问题。围绕这些问题，当时的帝王、后宫、大臣以及地方州府乃至普通民众，对于星变的反应和救护措施，成为特定社会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同时，星变的出现始终与中古社会中普遍意义上的天命观念相联系，因此，不论星占的综合考察或专题研究，对于理解和认识特定社会的知识、思想和信仰状况，相信会有辅助意义。

就唐史研究而言，20 世纪无疑是一个丰收与辉煌的时代。一方面，诚如张广达先生所言，“《二十世纪唐研究》向人们展现了前一时期作为经济基础的土地制度、赋役制度、财政制度，作为政治制度的律令格式、职官、兵制、选举，作为文化艺术的诗歌、传奇、变文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成就斐然”。^③ 传统的史学模式和结构使得我们不得不将广阔的视野投向时下学术界

① 张荣明：《权力的谎言——中国传统的政治宗教》，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31 页。

② 比如，根据唐星占大师李淳风的撰述，隋代的天象记录中，诸如隋文帝统一江南、太子杨勇废为庶人、隋文帝卒亡、隋炀帝讨伐吐谷浑及高丽、杨玄感兵变、宇文化及弑君、王世充诛杀恭帝及“篡号郑”，甚至宰臣如鲁公虞庆则伏法、齐公高炯除名，都有特定的天象予以警示。这种天象的“征”与“应”，在李淳风撰述的《晋书·天文志》、《隋书·天文志》中有生动反映，详见本书附录五《〈晋书·天文志〉“史传事验”编年表》、附录六《〈隋书·天文志〉“五代灾变应”编年表》。

③ 张广达：《关于唐史研究的几点浅见》，《中国学术》2002 年第 1 期；后收入《二十世纪唐研究》序言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倡言的“边缘地带”。^①但是另一方面,应当看到,现有的唐史研究结构中仍然呈现出一种极不平衡的状态。比如,在基本文献的利用与研读上,唐史学界往往关注于《职官志》(《百官志》)、《食货志》、《兵志》、《选举志》、《刑法志》、《地理志》等的史料价值,由此解决了一系列相关的政治、经济、军事、选举、地理等方面的重大问题。相较而言,两《唐书》中《礼仪志》、《音乐志》、《律历志》(《历志》)的整体研究,学界明显关注不够。至于《五行志》和《天文志》,无论史料的研读、挖掘以及专题研究,都未能引起学界应有的兴趣和重视。

毋庸置疑,《五行志》、《律历志》、《天文志》同其他志书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史料价值。比如《五行志》既是了解传统意义上普遍思想与观念的重要资料,而且对社会史特别是灾荒史、人口史、科技史等的研究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②《律历志》和《天文志》是探讨中古天文、历法的直接资料。由于“天降灾异”的警戒意义,异常天象的记录与解释成为帝王政治“参政”、“修政”的重要依据。因此,《天文志》的价值,或许并不仅仅在于天文历法的研讨,而从天象引发的人事活动中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特定社会的绝好角度。换

① 关于“边缘地带”,学术界普遍看好20世纪90年代社会史学的兴起。尤其民间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领域已经广泛地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相对于传统史学而言,史学界的“边缘地带”应该具有较为宽广的研究领域,而不能仅仅局限于社会史的定位。早年,国学大师梁启超在《史之改造》一文中曾说:“学术愈发达则分科愈精密,前此本为某学附庸,而今则蔚然成一独立科学者,比比然矣。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于史,厥后经二千年分化之结果,各科次第析出,例如天文、历法、官制、典礼、乐律、刑法等,畴昔认为史中重要部分,其后则渐渐与史分离矣。今之旧史,实以年代记及人物传之两种元素糅合而成。……虽然,今之史学,则既已获有新领土。而此所谓新领土,实乃在旧领土上而行使新主权。例如天文,自《史记·天官书》迄《明史·天文志》皆以星座躔度等记载充满篇幅,此属于天文学范畴,不宜以入历史固也。虽然,就他方面言之,我国人何时发明中星,何时发明置闰,何时发明岁差,乃至恒星、行星之辨别,盖天、浑天之论争,黄道、赤道之推步等等,此正吾国民继续努力之结果,其活动状态之表示,则历史范围以内之事也。是故天文学为一事,天文学史又为一事。”显然,任公此番关于史学“新领土”改造之论断,对于我们今天历史研究趋向的把握,不乏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参见梁启超:《史之改造》,《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

② 陈其泰:《〈汉书·五行志〉平议》,《史学与民族精神》,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1—265页;陈业新:《两〈汉书〉“五行志”关于自然灾害的记载与认识》,《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43—48页。

言之，异常天象暴露了当时政治、军事、祭祀以及社会中的各种具体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正是史家关注的核心所在。比如，大家熟知的“玄武门之变”，固然是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矛盾的集中体现。但是研究表明，这一事件的及早发生，却与当时“太白经天”的两次出现具有很大关系。^①特别是在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天象的变化似乎反映着天命转移的象征意义，故在帝王易位、宫廷政变和兵事谋叛中，总会有人从天象的角度来为事变的正常进行寻找合理依据。^②无疑，天象的描述与探讨从一个侧面加深了我们对具体历史事件的准确理解。因此，对两唐书《天文志》的梳理与挖掘，必将有助于我们对唐代历史的整体把握与认识。

学界共知，唐宋是中古天文、历法之学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官方天文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尤其是历法的推演、修订和天文仪器的制造成为这一时期引人瞩目并令人叹为观止的内容，这也引起了天文学史专家的高度重视。但是，有关天文的社会特征以及民间社会对于天文的认识，长期以来却不为学者所重视。另外，自六朝以来，以天竺为核心的西域天学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土，^③这在虚怀若谷，兼容并包的李唐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且不论天竺“天学三家”^④和波斯人李素父子的天文活动，单就开元七年(719)颉宾“遣使来朝，进天文经一夹”和吐火罗国支汗那王帝賧“献解天文人大慕闍”这两件事来说，^⑤也有极其丰富的象征意义。此外，还有敦煌发

① 郑宝崎：《“玄武门之变”起因新探》，《文史哲》1988年第4期，第22—25页。

② 赵贞：《唐前期政治斗争中的天文背景》，《晋阳学刊》2011年第6期，第108—110页。

③ 江晓原：《六朝隋唐传入中土之印度天学》，《汉学研究》(台湾)第19卷第2期，1992年；收入《江晓原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278页。

④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天学》，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74—78页。

⑤ 《颉宾传》载：“开元七年，遣使来朝，进天文经一夹、秘要方并蕃药等物，诏遣册其王为葛罗达支特勒。”[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09页。《册府元龟》卷997《技术》载：“吐火罗国支汗那王帝賧，开元七年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闍，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唤取慕闍，亲问臣等事意及诸教法，知其人如此之艺能，望请令共其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奉。”参见[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36页。

现的七曜历日，虽然学术界讨论很多，^①但是研究的空间和余地还很大。因此可以说，对于中原与西域之间天文、历法交流的研究，相信仍然是一项很有意义的课题。

现在，让我们浏览一下唐代制度建设中效法“天文”的若干现象。《通鉴》卷一八七武德二年(619)载：“秋，七月，初置十二军，分关内诸府以隶焉，皆取天星为名，以车骑府统之。”这就是说，府兵制下关内十二军的命名，俱是天上星官的名称。《旧唐书·傅奕传》载：“奕所奏天文密报，屡会上旨，置

① [法]伯希和、沙畹撰，冯承钧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3—104页；王重民：《敦煌本历日研究》，《东方杂志》第34卷，1937年；收入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6—133页；邓文宽、马德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科技卷(一)，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4页；叶德禄：《七曜历输入中国考》，《辅仁学志》第11卷1、2期合刊，1942年，第137—157页；刘世楷：《七曜历的起源——中国天文学史上的一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59年第4期，第27—39页；庄申：《蜜日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1本，1960年，第271—301页；[日]藤枝晃：《敦煌历日谱》，《东方学报》(京都版)第45期，1973年，第377—441页；饶宗颐：《论七曜与十一曜——记敦煌开宝七年(974)康遵批命课》，《选堂集林·史林》，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71—793页；施萍婷：《敦煌历日研究》，敦煌文物研究所编《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5—366页；《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科技卷(一)，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76—111页；[日]石田干之助：《以“蜜”字标记星期日的具注历》，《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9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28—442页；高国藩：《论敦煌唐人九曜算命术》，《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天津出版社1993年版，第775—804页；江晓原：《东来七曜术》(上)，《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2期，第100—103页；《东来七曜术》(中)，《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3期，第23—26页；《东来七曜术》(下)，《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4期，第54—57页；《〈七曜攘灾诀〉传奇》，《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3期，第42—45页；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钮卫星、江晓原：《〈七曜攘灾诀〉木星历表研究》，《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年刊》1997年，第241—249页；邓文宽：《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法]Marc Kalinowski, *Divination et société dans la Chine médiéval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2003, pp. 237—241, pp. 253—254, p. 260；钮卫星：《西望梵天——汉译佛经中的天文学源流》，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赵贞：《“九曜行年”略说——以P. 3779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3期，第22—35页；罗增祥：《二十四史中的七曜历初考》，《文教资料》2008年7月号下旬刊，第71—73页；陈志辉：《隋唐以前之七曜历术源流新证》，《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第46—51页；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参旗、井钺等十二军之号，奕所定也。”^①按傅奕，武德元年为太史丞，二年迁太史令，因为所奏天文灾祥“屡会上旨”，故而得到高祖的特别赏识，由此主持了关内十二府军的命名活动。对此胡三省作注说：“以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玄戈军，醴泉道为井钺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骑官军，宁州道为折威军，岐州道为平道军，幽州道为招摇军，西麟州道为苑游军，涇州道为天纪军，宜州道为天节军。”^②这里“参旗”、“玄戈”、“井钺”、“羽林”、“骑官”、“折威”、“平道”、“招摇”、“天纪”、“天节”等俱是星官名称。^③“鼓旗”是河鼓和旗星的合称，将它用于军府的命名，仍然具有旗开得胜的象征意义。^④至于“苑游”，在中古的星官体系中无法确定。联系“鼓旗”的命名情况，笔者推测，“苑游”恐是“天苑”、“九游”二星的合称。^⑤

其实，对于天上星官的仿效和模拟，在唐代的职官建制和改革中也有表现。《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内官时说：“妃三人。”其下注曰：“《周官》三夫人之位也。隋依周制，立三夫人。武德立四妃：一贵妃，二淑妃，三德妃，四贤妃，位次后之下。玄宗以为后妃四星，其一正后，不宜更有四妃，乃改定

①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79《傅奕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15页。

②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7高祖武德二年(619)七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858页。

③ 《隋书·天文志》：“招摇一星在其(梗河)北，一曰矛楯，主胡兵。……玄戈二星，在招摇北。玄戈所主，与招摇同。或云主北夷。客星守之，胡大败。……天纪九星，在贯索东，九卿也。……左右角间二星曰平道之官。……东井钺前四星曰司怪。……亢南七星曰折威，主斩杀。……骑官二十七星，在氐南，若天子武贲，主宿卫。东端一星，骑阵将军，骑将也。南三星车骑，车骑之将也。阵车三星，在骑官东北，革车也。……羽林四十五星，在营室南。一曰天军，主军骑，又主翼王也。……毕附耳南八星，曰天节，主使臣之所持者也。……参旗九星在参西，一曰天旗，一曰天弓，主司弓弩之张，候变御难。”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535—552页。

④ “东北曲十二星曰旗。”《正义》曰：“两旗者，左旗九星，在河鼓左也。右旗九星，在河鼓右也。皆天之鼓旗，所以为旌表。”(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96页)[唐]魏征：《隋书》卷19《天文志上》：“河鼓三星，旗九星，在牵牛北，天鼓也，主军鼓，主铁钺。……旗即天鼓之旗，所以为旌表也。左旗九星，在鼓左旁。”([汉]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537页)由此看来，“鼓旗”当是“河鼓”和“旗星”的合称。

⑤ 《隋书》卷20《天文志中》：“天苑十六星，在昂毕南，天子之苑囿，养禽兽之所也，主马牛羊。……西南九星曰九游，天子之旗也。”(第552页)据此，苑游似为“天苑”和“九游”的合称。

三妃之位：惠妃一，丽妃二，华妃三，下有六仪、美人、才人四等，共二十人，以备内官之位也。”^①同书《后妃传》载：“开元中，玄宗以皇后之下立四妃，法帝妣也。而后妃四星，一为正后。今既立正后，复有四妃，非典法也。乃于皇后之下立惠妃、丽妃、华妃等三位，以代三夫人，为正一品。”^②唐初高祖建国后，内宫中设置了贵、德、淑、贤四妃，位次皇后之下。以后经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四朝，内官“一后四妃”的建制就这样延续了下来，中间始终没有任何变更。然至开元年间，玄宗始对祖宗所定内官制度进行变革。先是后妃人数减少一人，接着名称也改变为惠、丽、华三妃。而这样的内官变更，显然是以《星经》所谓“后妃四星”的记载作为基本依据的。

再看内侍省。《旧唐书·职官志》载：“《星经》有宦者四星，在天市垣，帝坐之西。《周官》有巷伯、寺人之职，皆内官也。前汉宫官，多用士人，后汉始用宦者为宫官。……隋为内侍省，炀帝改为长秋监，武德复为内侍。龙朔改为内侍监，光宅改为司宫台，神龙复为内侍省也。”^③《旧志》首先将内侍省与天市垣中的宦者星联系了起来，随后表明唐内侍省是在继承前代内官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于宦者星，《隋书·天文志》载：“宦者四星，在帝坐西南，侍主刑余之人也。星微则吉，明则凶，非其常，宦者有忧。”^④这里“侍主刑余”描述的是内宫中侍奉帝后嫔妃的宦官人员，而这其实正是唐内侍省的官员建制。正因为如此，在中古的星占系统中，天市垣中宦者星的明暗程度，常常预示着后宫集团中宦官人员的吉凶祸福。

无独有偶，唐宗正寺的情况也是如此。《旧唐书·职官志》云：“《星经》有宗正星，在帝座之东南。秦置宗正，掌宗属。梁置十二卿，宗正为一，署加寺字，隋品第二。光宅改为司属，神龙复之也。”^⑤显然，唐宗正寺的设置，是对前代宗正职官的直接继承和沿袭，因而本不与天文星象有任何关系。但因为《星经》中有宗正星，故自然而然地与唐宗正寺联系了起来。《隋书·天文志》载：“宗正二星，在帝坐东南，宗大夫也。彗星守之，若失色，宗正有事。

① 《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第1866—1867页。

② 《旧唐书》卷51《后妃传上》，第2162页。

③ 《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第1870页。

④ 《隋书》卷19《天文志上》，第536页。

⑤ 《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第1880页。

客星守动，则天子亲属有变。客星守之，贵人死。”^①因此，宗正星的变动，往往成为“宗大夫”以及皇族宗亲有事的象征。

在帝王政治中，明堂既是天子“布政”和宣明政教的地方，也是皇帝举行“敬天”礼仪的重要场所，明堂制度的建设，往往以天上的星空世界为依据。总章二年(669)高宗在《定明堂规制诏》中说：“堂心之外，置四柱为四辅。按《汉书》，天有四辅星，故置四柱以象四星。内以八柱承天，外象四辅明化。……八柱四辅之外，第二重二十八柱。按《史记》，天有二十八宿，故有二十八柱。”^②这里“四辅”，在星官体系中有两层含义。其一为紫微垣的四辅星。《隋书·天文志》云：“抱极枢四星曰四辅，所以辅佐北极，而出度授政也。”^③其二，太微垣的东、西两藩中，各有上相、次相、上将、次将四星，“所谓四辅也”。联系明堂布政的基本功能，与四柱对应的是辅佐北极的四辅星。至于二十八柱，则直接仿照了天上的二十八宿，当然也是效法天文的生动事例。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唐代都城的建筑和命名上也有体现。有学者指出，唐单于督护府是仿照二十八宿中奎宿的形制来设计的，而从遗址所示的城垣轮廓来看，古城的形制与奎宿星座的连线极为相似，可以证明这是天道观念在城市建筑上的反映。^④不唯如此，东都(洛阳)皇城、宫城的命名，则直接借用了星官体系中太微垣和紫微垣的名称。尤其是太微垣南藩中间星官为端门，端门左右两侧的星官分别是左掖门和右掖门。这种布局，与隋唐时期东都洛阳的皇城结构正相符合。又《新唐书·地理志》载：“皇城长千八百一十七步，广千三百七十八步，周四千九百三十步，其崇三丈七尺，曲折以象南宫垣，名曰太微城。宫城在皇城北，长千六百二十步，广八百有五步，周四千九百二十一步，其崇四丈八尺，以象北辰藩卫，曰紫微城，武后号太初宫。”^⑤我们知道，无论西京还是东都，宫城都是帝王后宫居住的地方，而皇

① 《隋书》卷 19《天文志中》，第 536—537 页。

② 《旧唐书》卷 22《礼仪志二》，第 859 页；高宗《定明堂规制诏》，《全唐文》卷 13，中华书局 1983 年影印本，第 156 页。

③ 《隋书》卷 19《天文志中》，第 530 页。

④ 陆思贤：《从唐单于督护府城垣看我国古代城建天道观》，《科技史文集》第 16 辑《天文学史专辑(4)》，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5—70 页。

⑤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 38《地理志二》，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982 页。

城则为政府官署的办事机构。在中古的星官体系中，紫微为“太帝之坐”，“天子之常居”，居于北天的中央位置，垣内星官多与帝王后宫有关，因此对应于人间社会，紫微正是天子居所——皇宫的象征。至于太微垣，“天子庭也”，其内星官由于俱为帝王政治中的政府机构和文武职官，故而应是中央王朝政府的象征。^①由此看来，皇城和宫城由于职能的不同使得它们在政治功用上有所区别。这种区别与星官体系中太微垣和紫微垣各自象征意义的差异比较相似。但更为重要的是，皇城、宫城的政治功用，似乎能在太微、紫微的象征意义中找到各自的合理依据。这或许就是东都皇城、宫城命名效法天文的内在逻辑吧！

总之，以上选取的若干侧面旨在说明，古代天文的概念绝不限于今天纯正的观天象、定历法的自然科学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天文”被赋予了浓厚的“人文”内涵，渗透到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可谓是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②李约瑟先生曾说：“天文与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③一方面，天文为圣王的教化天下提供了一定的规范和模式。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在于此。另一方面，天文还是圣王“参政”的重要依据，^④具有经世致用和指导社会实践的功能。《旧唐书·经籍志》收录了唐代的天文著作 26 家 260 卷，^⑤《新唐书·艺文志》所载虽然只有 20 家，但总计有 30 部 306 卷，另有“失姓名六家，李淳风《天文占》以下不著录六家，一百七十五卷”^⑥，显然已经超过了《旧志》的数量。而在两《唐书》著录的天文著作中，《天文占》成为压倒一切的作品。因此可以说，中古天文的社会特征主要体现在仰观天象以占人事吉凶的学

① 陈遵妣在《中国天文学史》第二册中说：“紫微宫是皇宫的意思，各星都以适当的官名和其它名称”，“太微是政府的意思，所以星名多用官名”，颇有道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93 页、第 298 页。

② 席泽宗：《天文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社会功能》，收入氏著《科学史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33—164 页。

③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 4 卷《天学》，第 2 页。

④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汉]班固：《汉书》卷 30《艺文志》，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765 页。

⑤ 《旧唐书》卷 47《经籍志下》，第 2037 页。

⑥ 《新唐书》卷 59《艺文志三》，第 1545 页。

问——星占的重要价值上。

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以《唐宋天文星占与帝王政治》为题，以文献记载中的异常天象及其占验为核心，针对天象引发的人事活动进行重点探讨。需要说明的是：（一）本书的星占主要界定于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彗星、流星、老人星、客星、妖星、大星等的出现及占卜意义，而其他星象和各种云气，虽然也是与“天”有关的“技术和学问”，^①但此处不予讨论；（二）本书对于天文星占的研究，重点以唐代为主，同时根据材料的前后延伸和拓展，在某些问题的考察中，适当将五代两宋也纳入考察的视野中；（三）帝王政治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强调的是帝王在皇权运作中的核心作用及其巩固王朝的政治举措。本书主要侧重于星变发生后政治中的核心人物——帝王和宰辅大臣的救护和反应措施，特别是以诏敕为中心的“修德”行为和“修政”措施，成为本课题讨论的重要内容。

二、学术史回顾

星占，顾名思义，是通过对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彗星、流星及各种云气等异常天象的观测和预报，然后依据有关理论，判断吉凶，进而做出与人事相关的若干解释。从这个意义来说，星占首先属于天文历算之学，它的首

^① 葛兆光曾说，自从春秋战国，甚至更早的时代以来，在古代中国知识世界中，有三类学问和技术很重要。一类是与“天”有关的方术，如天文历算、占星望气、式法选择、龟卜筮占、风角五音，也就是通过星辰运行的位置、星辰的色泽变化、云气的形状、云气的色彩、天地的对应关系、时令月日的活动安排、自然界各种声音中的细微征兆等，来判断吉凶前景；一类是与“地”有关的方术，如形法等，这类知识除了地理之外，常常兼有本草、博物、志怪，甚至趋吉避凶的意义；还有一类是与“人”有关的方术，包括占梦、招魂、厌劾、服食、房中、导引、药物等。这些在后世先被称作“方技数术”，后被当作“奇技淫巧”，最终被判定为“迷信巫术”的东西，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可能是正经的“学问”，既是知识人的文化，也是文化人的知识。参见葛兆光：《序》，余欣：《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要前提是对异常天象的准确观测与记录。^①另外,天象观测的记录总要回归或者比定到人事的解释上,因而星占又有占卜的内容和特点。职是之故,20世纪上半期那些关注天文、占卜的学者,如朱文鑫、容肇祖、刘朝阳、郭沫若、竺可桢、陈槃,以及日本学者新城新藏、饭岛忠夫、能田忠亮等,在他们的相关论著中,都不约而同地涉及了星占的相关内容。^②

1. 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研究

天文学史专家朱文鑫曾说:“历史之纪载,得天文以证明之,而天文之观测,又借历史以阐发之,天文学史者,所以明人类进化之次第,天学发达之源流也。”^③故天文学源流的梳理对于历史时期社会文化发展演进的探究同样重要。1955年,陈遵妫《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出版,^④虽然从内容和分量上,都显得比较单薄,但它毕竟是1949年后天文学史上的第一本专著,因此可以

① 李约瑟先生指出,中国古代的国家宗教从一开始就孕有天文学或者占星术性质,“天文学是古代政教合一的帝王所掌握的秘密知识,灵台从一开始便是明堂(祭天地的庙宇,同时也是天子礼仪上的住所)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不过,在对《周礼》相关内容的分析后,李氏称“冯相氏”为周王的天文学家,而确认“保章氏”为周王的占星家。显然,李氏对天文和星占的区别,是相当微妙的。参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天学》,第44—47页;江晓原也认为,古代中国之天文,实即现代所谓“星占学”(astrology)。参见江晓原:《上古天文考——古代中国“天文”之性质与功能》,《中国文化》第4期,1991年,第48—58页。

② 朱文鑫:《史记天官书恒星图考》,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容肇祖:《占卜的源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1928年,第47—88页;此据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52—308页;刘朝阳:《〈史记·天官书〉之研究》,《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7集第73、74期合刊,1929年,第1—60页;收入氏著《刘朝阳中国天文学史论文选》,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第39—104页;郭沫若:《释支干》,收入氏著《甲骨文字研究》,上海大东书局1931年版;《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5—340页;朱文鑫:《天文考古录》,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历代日食考》,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竺可桢:《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思想与时代》1944年第34期,第1—25页;陈槃:《讖纬释名》,《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1944年,第297—316页;〔日〕新城新藏著,沈澹译:《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中华学艺社1933年版;《中国上古天文》,沈澹译,中华学艺社1936年版;饭岛忠夫:《支那古代史と天文学》,东京,恒星社1939年版;能田忠亮:《东洋天文学史论丛》,东京,恒星社1943年版。

③ 朱文鑫:《天文学小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④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说，中国天文学史从此迈开了整体研究的步伐。1956年，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英文版问世，该书首次肯定了古代中国对于世界科技文明的巨大贡献，因而引起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度重视。在第二卷第十四章中，李氏对中国古代的伪科学(Pseudo-science)和怀疑主义传统(The skeptical tradition)发表了高论。其中“伪科学”，李氏主要定位为占卜(Divination)，具体包括龟卜与蓍筮、《易经》中的卦、占星术(Astrology)、择日、干支推命、堪舆(风水)、相术和手相、占梦、拆字九个方面。在这些“伪科学”中，占星术讨论的篇幅较多。李氏的兴趣似乎在于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比如具体星象的占卜意义，李氏将《史记·天官书》与巴比伦的楔形文字(Cuneiform)做了比较，指出古代巴比伦的预言与中国的预言有着极为相似的地方。^①在第四卷《天学·天文学》中，李约瑟从天文学文献、古代和中古的宇宙概念、天极和赤道特征、恒星的命名、编制和制图、天文仪器、历法天文学和行星天文学以及天象记录等方面，对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及其成就做了总体考察，并自始至终关注着中国古代天文学独立发展的可能程度。^②但由于条件所限，李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当时的中国学者很难见到。直至1975年，《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文版才在北京问世。

需要说明的是，李约瑟对于二十八宿的介绍，历法天文学中干支六十周期，以及十二岁次的讨论，实际上都涉及了星占中的主要问题。作为一个对中国古代文明持有非常尊重与饱满热情的西方学者，李约瑟时刻关注着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科技文化交流。比如隋唐时期的天文学及其成就，李氏从“七曜日”文献的梳理中，指出七曜日“确实曾从伊朗文化区传入中国”。甚至中国的星历计算很可能也受到了古代巴比伦数学和天文学的影响。^③毫无疑问，李氏提出的这些问题，不论对于天文学史或者中外关系史都有重要意义，因而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思想史》(中译本)，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73—392页；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ume II *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346—364.

②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天学》，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

③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天学》，第81—82页。